

南方国家发展背景中的本土知识

张永宏¹, 胡立耘²

(1.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昆明 650091)

(2.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昆明 650091)

摘要: 南方国家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 蕴藏着丰富的本土知识。当今世界, 北方发达国家正在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 南北差距日益加剧。在此情势下, 南方国家应当把本土知识视为国家资本, 积极倡导本土知识的价值, 加强对本土知识的研究、保护和利用, 努力使其成为建构自主发展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的根本性力量之一。

关键词: 本土知识; 南方国家; 知识经济; 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F1/F11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772/j.issn.1009-8623.2010.12.007

本土知识是地方性知识, 与源自大学、研究机构和私人企业形成的全球性知识不同, 具有文化、社会、地域的独特性; 本土知识是被压迫的知识, 是后殖民时代被南北差距所唤醒的精神财富和智力资本; 本土知识是传统知识, 其有效性和经济性被长期的实践所证明, 与农业生产、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管理以及教育和知识创新密切相关。^[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殖民体系全面崩溃, 去殖民化进程快速发展, 到 20 世纪 60 年代, 绝大多数前殖民地纷纷取得独立, 一方面发展成为南方国家的主题, 另一方面西方主导的发展理论普遍受阻, 在此背景下, 本土知识逐渐在发展领域中兴起。到 90 年代后期, 一些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开始系统展开对本土知识的研究和应用, 与此同时, 南方国家建立了一批本土知识保护和利用的专门机构, 本土知识全面进入全球发展视域, 其全球性的影响日益

突出。

近年来, 发展领域丰富的实践不断证明本土知识的合理性, 使人们意识到本土知识的有效性、非从属性和被忽视性, 意识到本土知识在穷人减贫、乡村社区发展上的独特价值, 本土知识系统因而发生了从表述行为文化(performative culture)到实践文化(practiced culture)的转型, 在农业、环境、医疗、教育、技术创新、管理、数学、天文学乃至国家建构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南方国家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 蕴藏着丰富的本土知识。当今世界, 北方发达国家正在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 南北差距日益加剧。在此情势下, 南方国家应当把本土知识视为国家资本, 积极倡导本土知识的价值, 加强对本土知识的研究、保护和利用, 努力使其成为建构自主发展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的根本性力量之一。

第一作者简介: 张永宏 (1965-), 男, 博士, 云南大学出版社 编审,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方向: 世界史、科学史、国际关系。

收稿日期: 2010年9月3日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名称: “发展中国家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研究”, 项目批准号: 09YJAZH087。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名称 “少数民族地区本土知识的保护与利用”, 项目编号: 07z20708。

一、本土知识是南方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宝贵财富^[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升级,南方国家承受着多方面巨大的压力。

1. 经济全球化严重危害着全球公共资源,南方国家受害将最为深重

南方国家多属资源富集国,是许多物种的主要储蓄所,自然能源的主要产地,对全球公共资源的依存度很高,近30亿的贫困人口不仅是生物多样性最为切近看护者,而且还得依靠生物多样性资源生存下去,并获取发展的基本条件。有研究表明,越靠近赤道,生物多样性越丰富;越接近地球两极,生物多样性越贫乏。工业化国家主要分布在生物多样性贫乏的北方,而南方国家大多分布在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热带地区。热带地区拥有30万~75万种植物,全球具有医药价值的植物超过2/3的种类发源于南方国家。^[3]

今天全球食品基本供给主要依靠南方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诸如:野生动植物、森林和稀树大草原等。然而,这些资源却构成了北方国家的原材料的主体。南方国家由于缺乏现代开发技术或无力支付高技术成本,在全球资源利用中明显处于劣势,但却要为全球资源的保护承担相对更重的责任。

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物种消亡速度加快,森林覆盖面积缩减,海洋鱼类被过度捕捞,这些公共因素的变化趋势对南方国家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世界银行援引的资料预计,在未来的100年里,基础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的需求量将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至目前的2~4倍;在未来的50年里,1/4已知动植物(约相当于100多万种)物种有可能因气候变暖而消失;至2048年,海洋鱼类将全部耗尽。

目前,南方国家约有6亿多人面临实际的淡水短缺,估计到2020年,将有20亿~30亿人可能面临严重的淡水短缺。^[4]南方国家在资源枯竭和环境质量恶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不仅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受到制约,而且将为寻找替代途径而支付更高的发展成本,为防控疾病而消耗更多的资金。

2. 在经济全球化所催动的国际分工变局中,南

方国家受到知识、技能条件的限制,严重制约劳动力价格的提高

南方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八成左右,但普遍面临贫困、疾病的困扰。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贫困人口的97%分布在南方国家;2003年,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达10.68亿,占南方国家总人口的20.2%;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达26.71亿,占南方国家人口的50.5%。而且,世界银行对1980年和2002年世界收入分配情况所作的比较表明,2002年穷国的人均收入比1980年反而下降了,富国与穷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估计到2030年,南方国家的收入只及发达国家的1/4。南方国家由于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的限制,成为疟疾、麻疹、艾滋病等疾病流行的重灾区。南方国家在大量人口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境况之下,技能型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难以提高和扩大,而富国的高收入不仅使其创新得以在全球技术前沿扩展,而且造就了大量的技能型劳动力,共同支持着富国总的生产力要素的扩张。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年全球有劳动者30.77亿人,南方国家占84%,但其中的技能型劳动者只有10%。^[5]这种状况制约着南方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影响南方国家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收入份额的增长,最终难以遏制知识创新向富国集中、人才涌往富国的趋势。

3. 经济全球化使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威胁

随着强势国家和跨国机构对利益和机会的掠夺,以经济为中心定位世界的意识不断增长,文化帝国主义成为现实。结果,南方国家西化程度日益加深,阻碍了不同文化的并存,文化多样性普遍受到威胁。仅从教育看,长期以来,大多数南方国家都认为去背景化的西方教育系统是正确的。在这种认识驱使下,南方国家教育的定位主要不是为本土社区的发展服务,而是为政治、经济的西化做准备;不是为维系民众的生存需求服务,而是为全球经济机器承担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

事实上,对于广大的南方国家而言,全球化应理解为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组合。国际化是要遵循共同的标准和游戏规则,本土化才是融入全球的本质内涵。本土知识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现实功用的部

分,与环境长期共生共存,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促进就业和减贫、传承文化、推动知识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南方国家应该意识到,要在全球化进程中重塑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精神家园,特别需要确定本土知识及其与之相关的文化遗产的作用。近年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南方国家是否能成功地找到与西方互惠互助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全球定位,引导人民转向其文化之根,在现代和本土之间发展一种辩证的、建设性的联系,这一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同时也照亮了本土知识的意义。确实,对于南方国家而言,要走出全球化的困境,参与全球知识生产以及全球理性和全球安全的建构,就必须在开放吸收的同时,主张并大力推进文化多样性建设。为此,启动本土知识资源,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

二、本土知识是南方国家建构本土发展策略的知识基础

尽管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玛格丽特·米德、鲁斯·本尼迪克特、乔治·福斯特等均承认,不存在唯一的、必然的和普适的发展模式,更不存在什么所有国家都要遵从的全球模式,文化的独特性和相对性才是通则,但是,发展人类学家弗兰西斯·萨顿仍然认为,不同文化终将通过相同的文化进程而达致发展和现代化。事实上,经典的发展主义理论家大都秉持以罗斯托模式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观。发展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断言,所有社会都必然经历通向现代的五个发展阶段:落后的、欠发达的传统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起飞准备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起飞阶段→经济成熟阶段→高额大众消费阶段。步其后尘,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模式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传统社会的归属取向、特殊主义、功能分散等变量最终都将无一例外地被成就取向、普遍主义、功能专一等现代社会变量所取代;西摩·马丁·李普赛特通过考察“社会动员”和“民主的社会前提”后指出,只要注入资金、教育群众,民主和发展就能够自动实现;政治家加布埃尔·阿尔蒙德在《发

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一书中提出一套功能主义的政治体系模型,包括:政治社会化、利益表达、利益汇集、政治交往、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实施、规则的裁定等7个要素功能,认为对所有国家都是有效的。然而,事实证明,发展没有如期实现,民主也没有自动现身。^[5]

实质上,以罗斯托模式为基础的发展理论,都基于传统和现代的两分法,把西方奉为主臬。虽然,发展主义被斥为不过是西方学者书斋里的理想,但是,后来相继出现的文化解释模式、依附理论、制度解释模式等新的发展理论,仍然没有改变以罗斯托模式为主的西方援助政策。现实中的官僚威权主义和以官僚威权主义为核心的统合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显得十分奏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始终无法挣脱发展对人权、民主的西方式诉求。于是,自由主义被召回,继进口替代模式之后,华盛顿共识把开放的市场、自由贸易和民主人权绑在一起,成为推动南方国家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

然而,南方国家穷困的境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许多南方国家受到三重压力的困扰:国内储蓄率低、政府借贷和负债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至2000年,拉美地区的情况并没有比20年前有什么好转,8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富悬殊在全球最为严重,贫困线下的人口比1980年增加了4000万。^[6]

相反,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土发展模式迅速崛起,东亚、印度、非洲、拉美都在不断探索、整理、提升自己的。虽然本土发展模式多种多样,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在政治运作、族群偏向、信仰纷争、实用性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对接等方面都存在着界定和操作的困难,很少有成型的本土模式能完好、独立地发挥作用,但是,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一国的的发展虽然很难归于某种单一的发展模式,但本土发展模式至少不失为混合发展形式之一。^[7]因为,本土发展模式毕竟是自立、自为的根本,本土发展模式即使难以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施展,但在社区层次上的有效性、适合性、经济性、可持续性不断得到确证。^[8]众多的本土实践证明,本土知识作为传统知识,承载并反映着社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在发展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功用和理论内涵,是建构本

土发展策略的基础。^[8]把知识作为发展的武器,这一点在南方国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支持知识在发展中应用的国家政策不断出现。过去,南方国家发展政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实践的采用方面,以服务于社会现代化和生产转型为目的,在发展进程中促进本土实践则很少被系统考虑,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90年代以来,各种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把本土知识从民俗的王国里移入发展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关键的后续策略是国家管理者如何精心制定特殊的政策以支持获取知识(接近和采纳全球知识,发现和捕获本土知识)、吸收知识(创造终生学习的机会和机制)和传递知识(利用新信息技术的潜能,促进穷人对知识的接受)。^[9]一些南方国家正在系统地关注这一问题。^[10]

三、本土知识是南方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资本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名为《走向知识社会》(Towards Knowledge Societies)的报告指出,知识社会的兴起给南方国家带来新的机遇,本土知识正在成为发展的新起点;对南方国家而言,应推进丰富的本土知识向前发展,并与国际知识相连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只是消费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知识社会的发展,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知识社会模式,每一种社会都应倡导其本土知识的价值。

其实,即使在工业社会里,西方知识的重要性多么突出,也不过是众多知识体系中之一。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规范知识(formal knowledge)与非规范知识(non-formal knowledge)即本土知识二者是并存的。规范知识指以西方教育系统为主产生的知识系统。之所以称其为规范的,不过是因为它具有书写文档、标准和规则以及技术设施的支持而已。本土知识是在人们与自然环境长期紧密的相互影响中保留和发展起来的实践、陈述体系,是一种包含了语言、命名和分类系统,利用资源的方式,礼仪、精神和世界观的文化复合体。虽然本土知识大多主要通过口传的形式代代相传,很少被文本化,但同样具有相对的完备性。这种知识体系为本土社

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务提供决策、判断的基础,如狩猎和采集、捕鱼、动物驯养、农业、资源管理、健康以及对环境和社会变化的适应等。在现代社会,超复杂性问题的增多,如贫困、人口、环境、能源、安全和社会管理等,科学单枪匹马作战被证明是难敷使命的,而众多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本土知识相连之处,往往是知识创新的生长点。有关的实践表明,与现代制药方法相比,本土知识在筛选植物的医用价值方面,有效性比例可提高4倍;生物选择的成功率试验比例可以从万分之一提高到1/2,本土知识与其他知识系统的相互作用已成为研发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机会所在,没有本土知识的输入,今天使用的很多有价值的医药产品,将不被发现。^[11]因此,南方国家应把本土知识看作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资本,特别要重视对教育——知识传承和知识生产的重要系统——的研究和改造,倡导把本土知识嵌入其中,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教育系统,为自主知识创新体系的形成铺平道路。

但是,知识经济运行的基础依然是商业原则。发达国家向南方国家的技术转移,主要渠道是通过工业制成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以及直接投资。在国际贸易中,南南协议一般只涉及商品贸易,而北南协议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保护投资的原则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这样,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附加协定》(TRIPs-Plus)的保驾护航之下,由专利引动的资金流大量流入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估计,2001年流入美国、德国的专利报酬高达190亿美元和70亿美元。^[12]总的说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必将增强总体的创新能力和投资环境潜力,但是,南方国家必然要为更高的技术价格付出代价。例如:随着技术保护措施加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利益与权限不断得到明晰的界定,数字图书馆、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在线数据库等资源的使用门槛不断提高,南方国家不得不为随之形成的知识壁垒、数字鸿沟支付高昂的费用。另外,与科学日益商业化有关的处于变动之中的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和地缘政治环境,使知识财产的控制和管理越来越成问题:

首先,在国际领域,各国因工业化水平和研发

能力不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也不同。一般而言,技术发达的国家赞成加强保护,而技术落后的国家赞成较低程度的保护。在19世纪,这种差别主要存在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目前,发达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别日益凸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差异,与各个国家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差异也大体是相似的。

其次,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知识产权领域出现日益扩大的模糊地带。知识产权体系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收益,更重要的是在于鼓励知识的传播,并以此提高进一步创新的可能性。多种信息在电子层面上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提高了信息的共享度,促进了研发(R&D)领域的创造性合作,但是,这也可能会威胁知识财产体系的核心,因为它使得知识财产的法律范畴和经济范畴之间——即“所有者”和“作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难以界定,也很难得到保护。

最后,一些公司跨国发展其研究项目以及把公司的实验室分布在不同国度,进一步加大了知识财产在国家边界上的松散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知识产权问题中心的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将如何平衡?由群体积累、传承的本土知识,将如何得到保护和分享?南方国家现在的专利不到全世界专利的1%,拥有互联网的人口仅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的10%,南方国家如何找寻知识创新的支撑点?这类问题成为南方国家避免被知识经济时代边缘化的关键性问题。^[12]

由此可见,在知识经济时代,南方国家应高度重视本土知识的产权保护,只有把知识社会建立在合理、公平的知识保护机制和制度之上,给本土知识以应有的地位,才能有效促进知识创新,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也才可能具备坚实的知识基础。

四、南方国家应正确理解、把握、评价本土知识

本土知识存活的最大障碍,是以实利主义理性范式(materialist-rational paradigm)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出于对西方利益的维护,自然不承认其他知识系统的价值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在近几十年里,“本土”(indigenous)和“知识”(knowledge)组合在一起,不仅指传统知识的内容和

形式,而且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扩张导致的知识、权力不对称,与南方国家的去殖民化运动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南方国家反对西方霸权的有力武器。但是,围绕本土知识的权力问题纠缠不休,甚至把本土人的自立和自治看作是本土知识的逻辑使命,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与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主题背道而驰,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南方国家需要把知识、权力与发展联系起来,对本土知识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为应对全球共同的问题,特别是贫困和环境问题,南方国家应意识到,只有政治上去中心化,文化上鼓励多元化,尊重传统知识、价值和制度,使科技创新和草根创新两股创造性力量整合起来,建构起利益和资源重新分配的政治学,才能推动民主的健康成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首要的问题在于,应高度重视本土知识在发展领域中的作用,充分意识到发展需要本土知识,同时,发展为本土知识的新生创造了机会和舞台,继而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开辟出一条现实的通道。当然,也要看到,本土知识在发展上的应用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更不可能是万能的。因此,没有正确的评价,就不可能有效保护和利用本土知识。对待本土知识,既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又不能无视殖民历史和南北矛盾所造成的权力失衡因素;既要避免民族中心主义,又不能陷入妄自菲薄的悲观境地;既要厘清本土知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更要辨析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差异与联系;既要注重本土知识的实践价值,重视本土知识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又要正确把握本土知识的作用边界。

本土文化核心的一些基础是否还会在将来存活?通过产品、仪式、表演存留下表面的文化多样性,其意义能否经受住全球化的考验?南方国家自主发展能力能否借助本土知识的力量跃上一个新台阶?从近年来的发展看,有几点是肯定的:一是本土知识正在获得新生;二是文化相对性理念正在赢得广泛的接受;三是南方国家的本土发展实践正在呈现着勃勃的生机。^[13]显然,一个有着多样知识系统和文化价值的未来世界,必将丰富南北关系的内涵,推动南北关系的建设性互动和发展。因此,南方国家应积极开展本土知识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引

导地方社区在知识共享和知识采用的基础上决策,以减少抵制现代科学和剥夺本土授权两方面的危险,解放并激活本土知识的潜能,使之成为建构自主发展能力的知识资本。■

参考文献:

- [1] 张永宏. 本土知识概念的界定[J]. 思想战线, 2009, (2).
- [2] 张永宏. 非洲发展视域中的本土知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0~32.
- [3] Crucible Group. People, Plants and Patents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 Trade and Rural Society[M]. IDRC, Ottawa. 1994. 118.
- [4] 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展望: 驾驭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145、154~158.
- [5] 霍华德·威亚儿达. 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M]. 刘青、牛可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5~47.
- [6] 霍华德·威亚儿达. 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M]. 董正华、胥涛、郑振清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51~158.
- [7] 张永宏, 胡立耘. 非洲防控艾滋病的本土模式[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4).
- [8] 刘鸿武, 张永宏, 王涛. 基于本土知识的非洲发展战略选择——本土知识研究论纲(上、下)[J]. 西亚非洲, 2008, (1)、(2).
- [9] Bhola H S. Reclaiming Old Heritage for Proclaiming Future History :The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Debate in African Contexts[J]. Africa Today, Bloomington, 2002, (49): 3.
- [10] 张永宏. 非洲建构自主发展动力体系的新探索——南本土知识国家战略述评.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09, (4).
- [11] 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展望: 贸易、地区主义和发展[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110、49.
- [12] 希拉·贾撒诺夫, 杰拉尔德·马克尔, 詹姆斯·彼得森, 特雷费·平奇. 科学技术论手册[M]. 盛晓明, 孟强, 胡娟, 陈蓉蓉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376~379.
- [13] Razak V M. Can indigenous Cultures Survive the future? Futures , 2003(35): 907~915.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the Southern Countries

ZHANG Yong-hong¹, HU Li-yun²

(1. Center of African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The southern countries are bio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rich areas containing abundant indigenous knowledge. The world today, North-South gap is growing because north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 leading role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th powerful technology. The southern countries should regard indigenous knowledge as the national capital, th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forces to establish self-development skills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value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enhance the research, protection and the utilization.

Key words: Indigenous Knowledge, Southern Countries, Knowledge-based economy; Economic globalization